



# 香港文匯報專訪鄭永年

時值中國收官「十三五」和籌劃「十四五」的新起點，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著名國際政治及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十四五」期間中國仍將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儘管與前二十年相比，當前正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國內社會主要矛盾變遷，風險挑戰前所未有，但站在更高的發展起點上，中國可以憑借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更開放的對外政策，把握自身崛起的歷史機遇，更主動作為，在產業轉型升級、適應世界經濟變局中獲取新的發展機遇及全球化紅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丑、李望賢 北京、深圳報道

## 為什麼說

# 中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

## 「十四五」可更主動作為 創造發展新紅利

將於本月26日至29日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鄭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暢談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機遇、挑戰以及發展重點。過去一年以來，中國突遇新冠肺炎疫情，同時也面臨外部環境的惡化，一些海外輿論認為，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窗口正在縮窄。9月中旬，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湖南期間強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鄭永年表示，儘管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趨緩，面臨的國際環境愈發錯綜複雜，特別是美國的蓄意打壓，使得過去中美關係這個對外關係的「壓艙石」出現問題，但習近平總書記認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是基於發展環境和階段作出的科學判斷。

**外企不會主動放棄華市場**

首先，從中國國內情況來看，市場規模巨大、經濟潛能依然很大。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14億人口，其中中等收入群體至少有4億人，相當於美國總人口，消費升級勢頭強烈。中國正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巨大的

市場潛力和民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為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

其次，從國際發展大環境和大趨勢來看，世界經濟開放發展與經濟全球化仍然是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西方的企業在中國投資，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為了掙錢。資本是逐利的，中國市場的規模已經在逐步接近美國市場的規模。如此大的體量，沒有一家企業會主動放棄在這個市場中分得一杯羹。

**中國已可主動創造「戰略機遇」**

他援引美國著名經濟研究機構彼得森智庫統計數據，過去兩年有6,000億美元流入中國，「我和美國駐華商會交流，他們沒有一個企業想離開或自願離開中國的。歷史上看，是白宮聽華爾街的，而不是華爾街聽白宮的。」

鄭永年指出，從國際機遇來說，過去中國是被動地接受了「戰略機遇」，即 giv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那麼隨着中國的崛起和在世界體系中地位的上升，中國已經從被動轉向了主動；就是說，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了很大的能力，來主動在世界舞台上為自己創造「戰略機遇」，而不是像從前那樣，經常受制於外部環境。只要中國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用更大力度的開放，打造更加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與世界各國分享發展機遇，就能為自己創造更多全球化紅利。



鄭永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 疫後「有限全球化」 倒逼中國製造升級

鄭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將進入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歷史攻關期，如何加快形成國內高質量產業鏈布局，盡快掌握「卡脖子」核心技術，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他認為，疫後將進入「有限全球化」階段，從客觀上倒逼「中國製造」轉型升級、向產業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發展。這也是新的戰略機遇期中尋機的題中之義。

鄭永年認為，儘管中國是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什麼都能生產，而且生產量很大，但長期以來產業鏈偏低端，附加值低，不掌握關鍵的核心技術，因此地緣政治一旦發生變動，就會受制於人。他提醒，從現在開始，要加快形成國內高質量產業鏈布局，盡快掌握核心技術，擺脫對外部產業鏈環節的技術依賴，真正拿出更多整裝的「中國製造」產品。

的核心技術掌握在人家的手裏，你還是不行，「汽車工業發展那麼多年，原創性的東西有多少？我們的飛機發動機是別人的，航天領域的很多芯片也是別人的，這些東西中國是會做的，但是沒有壓力就做不到。所以，來自於外部的壓力比內部的壓力更有效」。

他指出，這次新冠疫情將深刻影響地緣政治。全球化不會停止，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超級全球化」漸近尾聲，進入「有限全球化」階段，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新布局。目前有的國家已經開始把涉及國家安全的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或者分散風險，盡量把產業鏈放在不同國家。從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無疑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衝擊。但從長期看，中國將從「有限的全球化」中獲益：一方面，西方產業不可能全部撤離；另一方面，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產業鏈最齊全的國家，而且國內市場廣闊，中國企業不僅可以佔領西方企業留下的產業鏈空間，還可以向產業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發展。

### 外部壓力比內部壓力更有效

鄭永年認為，一個產品99%國產化，但1%



盡快掌握「卡脖子」核心技術，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圖為北京國際科技產業博覽會中展示的太陽能無人機。資料圖片

### 關於「戰略機遇期」



鄭永年指出，很多年來，「戰略機遇期」始終是中國領導層用來推進中國改革發展進程的關鍵詞。事實上，「戰略機遇期」的思維從改革開放早期就已經有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尚處於美蘇冷戰狀態，但鄧小平對國際局勢作出了重大的政治判斷：「和平和發

展」是世界兩大趨勢，中國要充分利用這個有利的國際環境來開展改革開放。

鄭永年認為，鄧小平的科學判斷使中國從外部準備戰爭、內部搞階級鬥爭的局面中掙脫出來，把政策重點轉移到改革開放，這為今後幾十年中國高速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新世紀之初，中國領導人正式提出「20年戰略機遇期」的概念，中國不僅在國內保持高速經濟增長，而且在利用經濟全球化方面、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實現了迅速追趕，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

## 政府市場協同 扶貧成效顯著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8億多人擺脫絕對貧困，這在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鄭永年表示，中國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充分發揮好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在強調社會二次分配的同時更加注重一次分配的作用，這一點值得世界其他國家借鑒。下一步，在精準扶貧的基礎上，要控制相對貧困人口。他指出，全球化的過程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也帶來了所有國家財富差異的擴大以及貧困家庭的增加。「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國家這幾年民主革命崛起，還有一些歐美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或者經濟民族主義。」

而中國除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還有更多的調控手段。而且中國一直在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這些企業對扶貧大有好處。當一個人失業了，光靠政府二次分配，很難過上一個比較體面的生活。而通過勞動所得，能夠實現社會發展與扶貧的雙贏。他認為，要做好扶貧，需要發揮好市場與政府的作用。市場是做大的餅，政府是分大的餅，光強調政府「分大餅」，就會導致絕對平均主義。只有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兩條腿走路，雙管齊下，扶貧才有希望。



檔立卡戶採摘西紅柿。資料圖片 口擺脫絕對貧困。圖為黑龍江建改革開放以來實現8億多人

### 西方調控經濟手段有限

但從中國的經驗來說，卻恰恰相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8億多人脫貧，正是因為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加入全球化浪潮。為何會出現不同情形，他分析，在歐美國家，資本主導一切，政府沒能在收入分配和社會公平方面起到應起的作用。實際上到現在為止，西方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仍十分有限，一個是貨幣政策，一個就是財政政策。

## 壯大中等收入群體 暢通「內循環」關鍵

鄭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一定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是社會穩定的根基。未來五年，中國需要特別重視培育、壯大中等收入群體，這關乎中國經濟擴內需、推動內循環、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是否成功，也關乎中國能否避免落入泰國、菲律賓、拉美那樣的中等收入陷阱。

他認為，一直以來中國拉動經濟靠「三駕馬車」，但現在「三駕馬車」中，外貿受到疫情巨大衝擊，基建在經歷過去多年的大規模投資後已經出現邊際作用遞減。要拉動經濟，主要靠消費拉動，這就意味着要進一步減少貧困人口、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使得消費力得到更大釋放。

鄭永年指出，中國目前有4億左右的中等收入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大約為30%，距離發達經濟體還有距離，但也意味著巨大潛力，「試想，如果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佔比也像美國那樣達到50%，那就是有7億中產，這得造就多大的市場？」

鄭永年認為，未來五年，中國應該通過提升低收入

### 倡提升「軟基建」加強社會保障

鄭永年建議，中國這一輪發力的關鍵應當在於「軟基建」，通過發展醫療、公共衛生、教育、公共住房、醫院、老人院、都市停車場等加強社會保障。不解決「醫療、教育和住房」這三座新大山，窮人很難真正脫離貧困，中等收入群體就沒有制度基礎，也沒法激發消費力，「培育中等收入群體，在未來三五年、十年來很關鍵。一旦經濟發展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就可能做不起来了，因此事不宜遲。」